

# 從確立規範到常態規範

##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控制

鄭廣懷 范一杰

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席捲而來，引起了社會經濟生活的革命性變化。祖博夫 (Shoshana Zuboff) 將分析和預測互聯網用戶的「未來行為」，進而精準地投放廣告，以實現資本積累的數字經濟稱為「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 ①。在監控資本主義下，市場作為「看不見的手」已經被轉化成智能的、跨越邊界的「巨大的他者」(big other)，它使得一切變得透明可視化、直觀可理解，並不斷通過優化算法來預測並修正人類認知和行為，作為製造收益和市場控制的手段②；與此同時，這徹底改變了人們的工作狀態和勞動過程。本文使用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權力技術理論來透視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下的勞動過程，試圖勾勒出勞動控制的發展與福柯的規範概念之間的緊密關係。本文認為，在勞動控制中存在着兩種不同的規範：「確立規範」(normation) 和「常態規範」(normalization)。確立規範的存在，基於工人具備主體性進而產生勞動力的不確定性這一基本假設。然而，監控資本主義的深入發展正在將工人逐漸從主體塑造成客體，常態規範可能成為當前技術和社會條件下勞動控制的新規範；對於勞動關係的研究者來說，理解常態規範的運作機制有利於拓展對勞動過程理論的認識。

### 一 確立規範對主體性的塑造：去除勞動力的不確定性

福柯對勞動過程研究的貢獻包含兩方面，首先是在關注的焦點上，他論述了「肉體的政治解剖學」，強調人們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體，通過所選擇的

技術，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後者不僅在「做甚麼」方面，而且在「怎麼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願望。福柯將這種權力技術稱為「規訓」：「這是一種謙恭而多疑的權力，一種精心計算的、持久的運作方式。」<sup>③</sup>福柯試圖從這些碎片化和具體的實踐、技術、機制中總結出一套完整的權力機制，指出控制得以成立的依據。在這個意義上，福柯使得勞動控制的研究轉向了具體實踐。這是福柯對於勞動過程理論的第一重貢獻。

福柯的第二重貢獻在於強調規範在控制中的作用。規範作為權力與知識的聯合產物，取代了法律、理論、制度，作為人們被劃分、被塑造的依據，它與同樣根植於日常的儀式和從個人身上獲得的知識相聯合，使得不遵守規範者被視為不正常的人，被視為「自然的」異端，必須由細密的權力機制加以改造。也就是說，在認知的角度上，統治關係與權力行使被自然化。這套機制一旦產生，反抗的可能就被徹底壓制。規範不允許一絲不確定的事物出現在其中，福柯將這種規範稱為「確立規範」<sup>④</sup>。

確立規範的概念對勞動過程研究提供了兩點啟示：第一，具體的實踐是權力控制的基礎，它意味着我們僅僅強調價值、意識形態和法律是不夠的，還需要關注具體規範及其相關知識、機制和技術。例如，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又譯布洛維)在生產實踐中發現的「趕工遊戲」<sup>⑤</sup>，是工人在生產過程中與資方達成同意的表徵，意味着工人致力於在枯燥的工作中你追我趕，努力添加遊戲的成份，從而使得被掏空意義的工作被重新注入意義。通過在遊戲中對工作環境的直接掌握，獲勝的工人在車間體驗到想像的自由。第二，通過規範來強調權力與知識的聯合作用。例如，要保證生產場所的權力運轉，不僅需要規範工人的動作，還需要工人對規範的認同乃至對勞動控制的自然化。勞動過程研究中探討的諸多「霸權」(hegemony)實際上都涉及到這一點。以下我們將運用福柯確立規範的概念來重新審視既有的勞動控制研究。

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的勞動退化》(*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中提出的核心問題是：勞動力的不確定性是怎樣通過資本控制去除的。布雷弗曼的回答是以精細化、標準化和數量化為特徵的「泰勒制」(Taylorism)，並總結了三個原則：一是使勞動過程和工人的技術分離；二是「概念」與「執行」的分離；三是利用對知識的壟斷來控制勞動過程的每個步驟及執行方式。在此過程中，工人發現自己成為「管理者的一個活工具」<sup>⑥</sup>。簡言之，工人的肉體被塑造為適應於特定生產的對象。

雖然在實際論述中布雷弗曼與福柯有頗多相似之處，但兩者深層的假設完全不同。首先，布雷弗曼所指的泰勒制是懸浮在實踐之上的理論。這種懸浮首先體現在經驗的脫節上，布雷弗曼提出的對知識的壟斷只是形式上的，實際上管理者不能、也沒有必要佔有那些知識，正如布若威所言，「作為增加資本控制的實踐工具，泰勒制是失敗的」<sup>⑦</sup>。其次，這種懸浮體現在對工人主

體性的認識上。布雷弗曼認為資本的管理剝奪了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但同時他也承認，儘管在科學管理下的工人近乎成為了「管理者的一個活工具」，但「他們的批判能力、才力和構想能力，不論如何被降低、如何被削弱，對資本家來說，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一種威脅」<sup>⑧</sup>。他在此暗示了工人的主體性會參與到工作場所權力關係的構建中去。遺憾的是，這種「威脅」並不是布雷弗曼的分析重點。當資本剝奪勞動者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時，布雷弗曼研究中的工人卻有時集體喪失了反抗的能力，甚至是反抗的欲望<sup>⑨</sup>。

後繼的布若威對於布雷弗曼觀點的修正在於兩個方面：一是更加深入到生產實踐之中，去具體探尋泰勒制如何實現權力控制；二是在理論上回答工人的主體性問題。在福柯的啟發下，布若威將目光投向車間生產實踐中的具體規範。他發現工作場所中的「趕工遊戲」使得工人自發塑造了對於工作的同意，這意味着工人的主體性在具體的生產過程中被塑造。布若威詳細敘述了「趕工遊戲」得以成立的具體條件。在這個過程中，由「趕工遊戲」自身組織起來的一大批相關的技倆、知識、規則構成了「車間的文化組織」，產生了與理論化的泰勒制所不同的、嵌入於實踐與控制末端的規範，以至於車間內的工人主動地進行超額生產被視為正常而合理<sup>⑩</sup>。然而，這種遊戲的產生不是突發靈感的創造，而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在實踐中的具體延伸。由此可見，權力體制不但生產了相關的知識，並依靠它們創造了規範。在實踐中，在權力控制的末端，以「趕工遊戲」為核心組織起來的規範代替了抽象的泰勒制，使得車間的生產以積極的方式進行，任何違背者都被這套規範和遊戲規則視為不受歡迎的人（破壞者）與不正常的人（失敗者）。由此可見，在主體性被塑造這一點上，福柯的規範理論與布若威的「製造同意」具有內在的親和性，即主體受到這些規範的塑造從而符合某一特殊目的。

此後的勞動控制研究大多繼承了布若威的思路，即不僅關注客觀的生產過程，更關注主體在生產之中的實踐。可以說，正是借助福柯的視角，布若威完成了對於布雷弗曼研究的超越，並開創出勞動過程研究的新議程。在評述布若威之後的研究時，聞翔和周瀟將勞動過程研究的新發展總結為邁向多樣主體性，即將階級之外的因素，包括性別、公民權、種族等都納入到權力不斷生成並塑造主體性的過程中去<sup>⑪</sup>。後繼的關於服務業的勞動控制研究中，對於福柯理論的運用更多。例如，何明潔採取「性別化的年齡」的概念，表明資方對女工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建立在社會文化傳統對女性年齡的社會性別建構及其造成的家庭角色和社會責任的基礎上，而且這一建構得到勞動者自身的認可<sup>⑫</sup>；藍佩嘉使用身體工程學的腳本解釋美妝師的塑造，闡明了勞動身體既受到性別或身體的話語建構，也被物質性地剝削的過程，資方的目的在於進一步塑造工人的身體動作、儀態展示和表情姿勢<sup>⑬</sup>。這類研究都關注勞動者在生產之中的實踐，尋找實踐過程中的規範與相關知識，從而分析主體是如何被勞動中的各種細緻的規範所塑造。

然而，在關於服務業的勞動研究中，出現了一些新的事物，並不是確立規範可以完全解釋的。霍克希爾德 (Arlie R. Hochschild) 使用「感覺規則」(feeling rules) 來描述在特定情境下情感表達的社會規範<sup>⑭</sup>。這意味着勞動者要將私人性的感受、情感與規範性期望結合起來，或者調整情感的外在表達，使之與被期望的情感表現保持一致<sup>⑮</sup>。威廉姆森 (Christine L. Williams) 和康奈爾 (Catherine Connell) 描繪了奢侈品零售行業的管理者依照「看起來好」和「聽起來對」的方式挑選員工，她們用「管理者尋找已經具備特定慣習的工人」來表示這個過程，這些「特定慣習」指的是與奢侈品的美學形象一致的人的「審美品質」(aesthetic quality)——這成為零售業指導勞動者行為的依據<sup>⑯</sup>。與審美品質相似的事物也出現在米爾斯 (Ashley Mears) 關於模特的勞動研究中，模特工作的核心是「成為一個外形」，而這種「外形」的依據也是「看起來不錯」<sup>⑰</sup>。而在網絡主播的勞動過程中，沒有確定內容的「情商」被用來作為評價主播行為的依據。作為運用情商的主體，主播需要針對不同情境和不同的人迅速作出正確的反應，所謂「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對情商的強調，既給主播提供了靈活應對的空間，又要求主播增進個人控制、運用情感的能力。儘管「情商」似乎說不清道不明，但它卻真切地體現在進入行業、直播實踐、退出行業諸環節中，對主播施以無形的約束<sup>⑱</sup>。

無論是「感覺規則」、「審美品質」，還是「外形」又或是「情商」，在工作的實踐中都發揮了規範化的作用，但這些發揮着規範作用的事物本身卻不是確立規範。首先，它沒有一個固定內涵，只是「看起來不錯，聽起來不錯」。儘管確立規範的內涵也可以隨着權力結構的不斷變化與生成而發生改變，但在任何一個給定的時刻，確立規範必須是一種確切的事物。其次，它沒有指向一個確切的作用對象，既可以用作對身體姿勢的要求，也可以對情緒抒發指手畫腳。而確立規範建立在嚴格全面的分類之上，它針對的是身體運行的特定部分。這些新的事物毫無疑問是權力控制得以實施的一種具體手段，對於它們的理解，需要我們結合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特徵來加以探討。

## 二 從主體到載體：監控資本主義與下載勞動

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到來之前，資本對勞動力的控制是以去除勞動力的不確定性為核心的，通過確立規範，資本及其管理者想方設法將勞動力擁有的勞動潛力轉變為實際勞動。這裏的基本假定是資本無論採取何種手段(包括技術和意識形態)，都不能完全去除勞動力的不確定性，因為這種不確定性源於勞動者作為人的主體性。但是，監控資本主義有可能將作為主體的勞動者徹底變成載體，而且這種塑造不僅在工作場所中，也在所有的社會空間(實體或虛擬空間)中展開。福柯指出，作為科學話語的醫學語言不只是對病人的描

述，也是對病人的揭示，它把人們自身建構成科學對象，繼而使其成為被話語塑造的存在<sup>⑩</sup>。循此邏輯，監控資本主義也可以依託「巨大的他者」來創造外賣騎手、網絡主播等作為載體的勞動者。這是通過對人們所處的「現實」的塑造來實現的，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有關身體行為、思想、事物的數據都成為實時動態的監控目標，進而產生了修改人和物的行為以獲取利潤和控制的可能性。簡言之，「現實」被商品化和貨幣化並再生產為人的「行為」<sup>⑪</sup>。

首先，在技術層面上，監控資本主義使得勞動力的不確定性基本消失，勞動者徹底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勞動力的不確定性所依賴的勞動潛力的「隱藏」幾乎不可能，強大的技術平台和被技術主導的管理使勞動者的任何不配合行為都無所遁形。簡言之，監控資本主義借助技術將工人從主體徹底塑造成為載體。工人的生產工具——電腦和人工智能這些看起來幫助工人更有效工作的工具，其實已經成為監控工人的工具。這徹底改變了人（資本家和管理者）與技術的關係：以前是技術協作管理，現在是技術（算法）主導管理。在大數據時代的平台經濟中，前所未有的技術可以用來測量、跟蹤、分析和執行工作，這在泰勒制的時代難以做到。新的跟蹤和監測技術允許管理人員通過積累和使用以前無法獲得的關於工人的數據，例如快遞員的工作軌跡、主播的語言表情、話務員的語氣聲調等，從而在更加強化的水平上控制工作。如果以前技術可以促進資本對工人的監控，那麼現在技術主導了整個監控過程，工人的勞動更容易被看透。他們的勞動愈來愈容易被榨取，因為新方法的湧現使得以前看不見的勞動變得清晰可見，這就在技術層面徹底消滅了勞動力的不確定性。在勞資關係中，圍繞勞動力的不確定性的鬥爭，其實也是關於隱私與監視的鬥爭——工人要保留自己控制的勞動力，而資本則致力於將勞動力全部置於監視之下。一旦監視走到極致，就是工人徹底從主體性上放棄了對自己擁有的勞動力的控制。質言之，算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老闆」。電子績效監控、人員分析、界面管理和大數據採集提升了工人的工作強度和工作壓力，剝奪了他們的內在生活和自我意識，他們會變得沮喪，感到無力、被拋棄，進而徹底壓制自我。正在這個意義上，人不再是主體，而是變成了載體。

其次，在規範層面上，監控資本主義通過移動互聯設備中的應用軟件（應用程式或軟體，APP）塑造人們的心智。表面上，人們下載並使用的是智能手機中的APP，但實際上通過使用條款和算法調控內嵌了權力關係、等級制度和霸權，包含着一套被人們所自然化的「理所當然」的思考和行動模式。監控技術不僅與社會控制緊密關聯，也與勞動控制緊密關聯。目前，快遞員、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家政工等大量平台勞動者都必須依靠手機APP開展工作，對於這些勞動者而言，APP不僅是技術載體，也是社會載體，內嵌了各種社會關係和規範。在這個意義上，APP所帶來的不僅是技術控制，也是規範控制。它試圖通過控制工人潛在的經驗、思想和感覺來引導他們做出符合

資本要求的努力。在規範的控制下，工人的行為符合平台公司的最大利益，不是因為他們受到實際的強迫，也不是純粹出於對經濟獎勵和制裁的工具性關注，也不僅僅是他們的行為和活動被指定、評估、獎勵或懲罰；相反，他們是由內在承諾、對公司目標的強烈認同，以及對工作的內在滿足感所驅動的<sup>20</sup>。從福柯的角度來看，通過監視施加有效控制的前提是，它被置於更廣泛的統治結構當中。隨着計算機網絡系統的普及，人們已經發現他們的日常活動愈來愈多地由數字化的系統來作為表達的中介。總體而言，個人往往在許多活動中感到被暴露在連接到計算機監控系統的網絡環境中。監視成為了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一種日常規範，這強化了人們對於監視的積極態度，渴望被數字網絡構成的「硅籠」(silicon cage) 保護；APP 也成為了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強化了工人在工作中對 APP 的積極態度。當手機 APP 在日常生活中變得愈加普遍的時候，工人可能會愈來愈認同在工作中使用 APP，而不會顧及隨之帶來的監控和隱私暴露，也不會考慮算法對工作自主性的直接干預。因為在 APP 徹底席捲人們的日常生活時候，工作世界概莫能外。

由此可見，有效的數據管理系統支持的先進技術的普及，提供了一種更廣泛、更模糊，但看起來侵入性更小和更強大的監視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勞動控制的模式傾向於虛假的自我控制 (pseudo self-control)，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外部機構或裝置的威懾效果。特別是在一個高度透明的社會中，大多數活動都被在線數據監控網絡「捕獲」，侵犯隱私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認為「監控的生活方式」理所當然的態度盛行<sup>21</sup>。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只能選擇與不斷增強的監視技術共存。

馬克思把工人勞動看成活勞動，把機器和技術看成是死勞動。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它隨着生產過程發生磨損並轉移到商品中去，活勞動才能創造商品的價值。這裏的核心是，死勞動需要活勞動激發乃至主導才可以發揮作用。但是隨着技術的發展，這種關係可能顛倒過來，工人的勞動變成了技術（或者人工智能）控制的勞動，死勞動主導了活勞動，或者說死勞動變得鮮活起來。基於監控資本主義下活勞動與死勞動關係的反轉，我們嘗試提出「下載勞動」的概念。下載勞動是指互聯網平台作為巨大的具備反思能力的實體，將一套精密且動態調整的勞動控制模式「下載」到工人身上，全面塑造乃至取代工人固有的主體性。它具有如下四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從工作空間來看，工人的工作空間源於虛擬空間的下載，只有當虛擬空間植入現實空間，工人才真正獲得勞動場所。例如，只有當外賣騎手被外送平台指定了送達地點並安排了最優路線，他們才得以確定現實中的工作路徑和地點。第二，從時間來看，由於 APP 與工人之間的高度捆綁，工人隨時處在「下載」和「上傳」的狀態中，他們的勞動時間既是線下的工作時間，也是在線的時間。第三，從人機關係來看，手機等智能終端使得工人全面接入了人工智能體系，對工人而

言，下載即監控，行為即數據。人機的無縫匹配，使得最先進的人工智能可以與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結合在一起，進而使得資本對勞動的榨取變得愈來愈無遠弗屆。第四，從人際關係來看，無論是工人與管理者、工人與消費者，還是工人之間的關係，都需要經過「上傳」和「下載」的過程，在互聯網平台這個巨大的具有反思能力的「他者」的調控下，進行行為修正與行為學習，並進行自我管理。

下載勞動是資本家的心智 (mind) 和勞動者的身體 (body) 的組合。下載勞動意味着工人的主體性是一個具身的結構，他們得以像計算機一樣思考，同時最大限度地冒着最大風險運用他們的身體來勞動，服從於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下載勞動的核心就是結構嵌入在身心當中，每個個體都是主導性結構的具體表達。比如，工人按照社會定義的理想自我 (如月入過萬元人民幣的自由騎手、未來的小老闆)，按照算法設定的一切來努力工作。下載勞動使得人成為支援 APP 的「硬件」。經過「下載」，工人可以隨時被植入系統，並按系統邏輯和指令運作。在這一過程中，系統試圖抽離工人的自我，通過植入預製的主導意識形態和行為模式，驅使工人按照預設並不斷優化的模式思考和行事。

在馬克思看來，「勞動」被定義為哲學的、本體論的和歷史的範疇，因為它是人類起源的原則，沒有它我們甚至無法設想人類生活的基本輪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服從於資本積累，它被當成像買賣的商品，工人被異化，但由於工人主體性的存在，也因此產生工人階級的持續抗爭。但是，監控資本主義將工人從主體塑造成載體。下載勞動的存在使得勞動與人性完全分離，勞動得以徹底從勞動者身上剝離出來，變成了技術支配的勞動，這構成了人的存在的根本危機。

### 三 常態規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控制

確立規範是在有限監控的條件下成立的勞動控制規範，正是因為主體性的存在，才使得具體的行為約束成為必要。如前所述，監控資本主義催生了下載勞動，工人的主體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工人處在幾乎無限的監控之下，從主體變成了載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新的規範來認識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控制。基於福柯的「生命權力」概念，我們認為，除了勞動過程研究者熟悉的确立規範之外，勞動過程中可能還存在另一種需要認識的規範。福柯認為，就生命權力而言，人們不再尋求一個最優模式，而是「對常態的不同曲線進行測定，而規範化的操作將調整這些常態的不同分布，使最不利的轉變為最有利的。……規範是不同的常態中的一個作用。規範性居於首位，而規範是從它推導出來的，或者正是從對常態的研究出發，規範得以



街頭巷尾到處穿行着受到算法直接指揮的外賣騎手。(圖片由陳龍提供)

確定下來並完成其操作性功能。……這裏不是確定〔立〕規範 (normation) 的問題，而是規範化 (normalisation) 的問題」<sup>23</sup>。本文將這種規範稱作「常態規範」。在這裏，規範意味着最有利的常態。首先，常態規範建立在對於不同常態的分析之上，它指向整體的良好運行，通過調整、排除的手段，使危及整體的不確定性消除，維持良好的常態，在勞動中發揮規範化的作用；其次，常態規範沒有確定的內涵，規範的對象從個人身體的運行變成了處於不斷流動狀態的載體所構成的群體，比如街頭巷尾到處穿行的受到算法直接指揮的外賣騎手。

常態規範允許個人的「自由」處置，這一點與確立規範尤為不同。在特定的範圍內，確立規範無所不包，所有人都被吸納到這個權力體系中。但是，常態規範是沒有確定內涵的規範，它驅使作為載體的勞動者基於被預製的思考和行為模式在具體的情境中行事，並不指向一個確切的動作和行為。常態規範不再尋找一個完美的資本主義生產者的模型；相反，它將所有能夠觀察的勞動者納入分析之中，使他們身上的特質轉化為集體層面的分布，再提取對資本剝削和掩蓋剩餘價值的最佳常態，進而加諸個人。以網絡主播為例，作為常態規範的情商具有如下作用：一是情商來源於對主播整體的觀察分析；二是情商在實踐中是一個可變的概念，隨着適用場景的變化而變化；三是情商作為一種行業內公認的規範，參與了對於主播主體性的干預<sup>24</sup>。在這個意義上，勞動的作用是幫助構建和維持平台的基礎設施，以及為數據中心和算法的優化提供數據。這裏的數據不是客觀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數據



的創建不是中立或自然的，而是有框架和有背景的。工人利用平台的漏洞在工作過程中摸索的「技巧」也是平台優化的數據基礎。例如，外賣騎手試圖通過合作跑單等方式來實現自身的技術控制權和自主空間，但實際上卻被更深地捲入到自己積極創造出來的更苛刻、競爭更激烈的勞動規則之中<sup>25</sup>。

在上述過程中，一切與最佳常態的相關知識的生產都是在整體的層面上進行的，它指向的是最佳常態在整體層面上穩定出現的概率；通過這個概率，常態規範劃定了甚麼情況是好的，甚麼狀態是需要警惕的。當規範的干預下降到個體層次，在調整、排除、篩選的過程中，個人面對總體上的龐大架構，面對以維護整體安全為理由的權力技術，主體性被徹底塑造，表現出對這個龐大的規範架構的屈服。常態規範的出現，使得勞動控制的重點不再是具體的勞動者如何行為，而在於形成一種去除工人主體性的「超有機體」，即每個工人既是直接接受指令的終端，也是按照事先預製並「下載」到工人心中的運作邏輯行事的個體。這使得每個工人的工作都能與勞動總量相聯繫，而不需要在工人之間形成直接聯繫。儘管實際上工人的勞動是相互協作的，但這種協作不是基於工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配合，而是工人被徹底原子化以後基於技術操縱所形成的配合。質言之，過去的工人是生產系統的一部分，是現代化的大型裝配線的一部分，工人與機器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替代的關係。但現在經過「下載」，工人可以隨時被植入系統，並按系統邏輯和指令運作，已經幾乎不存在工人替代機器（技術）的可能性。

基於常態規範和確立規範的對比，我們可以重新審視既有的勞動控制研究。如前所述，確立規範因去除勞動力的不確定性而生。資本家要充分發揮工人的潛力，就必須擁有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控制是勞動過程中的基本問題<sup>26</sup>。控制的根本目的在於去除勞動力的不確定性，因為資本家購買的勞動力與勞動力的實現是有區別的，推動勞動力實現的過程充滿了緊張和衝突<sup>27</sup>。這實際上表明了如下三點：第一，勞動力的不確定性是內嵌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必然屬性；第二，資本必須設法控制這種不確定性以保證勞動力能夠有效發揮，從而最大限度地促進剩餘價值的生產；第三，這種爭奪控制權的過程充滿反抗。因此，工作實踐中出現的各類確立規範，一方面要規訓勞動力，去除不確定性，使得它能夠發揮作用；另一方面還要維持與再生產這種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在這種控制思路中，勞動力的不確定性源自工人的主體性，它可以被認識、被預計從而最終極大地服從於資本家的利益。布雷弗曼對這種確立規範有着非常細緻的刻畫：「這個人的各項工作細節都有規定，鏟子的大小，鏟子插入生鐵堆的深度，一鏟生鐵的重量，走路的距離，搖擺的弧度和施密特每次休息時間的長短等都有規定。」<sup>28</sup>這一思路實際上是把權力技術機制視為對工人而言的異己力量，因此緊張的衝突和激烈的反抗是不可避免和普遍的，所有的控制本身就會激起衝突，但又設法徹底消滅這種衝突。

常態規範表明了另外一種控制思路，它將接受控制視為工人內在的心智，不關心單個的勞動力具體如何，而着力保證整體的安全，並使用調整和排除的手段，在流動的基礎上使得作為勞動人口的整體能夠以一種最有利於資本盈利的狀態運行。因而，衝突與反抗不被視作一個內在不可克服的問題，而只是一種不好的狀態，可以通過調整、排除等間接的手段使得狀態自行好轉。只要形成一種兼具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常態即可。在歷時的層面，常態是過去既有的系統運行狀態的總結提煉；在共時的層面，常態又是一種正在進行的實時調整的狀態。常態來自於勞動力本身的參與和構建，某種程度上，這就徹底去除了勞動力的不確定性和勞動者的反抗。例如，模特的外形規範本身是「浮動的」<sup>⑳</sup>，關於外形的規範既沒有特定的內涵，也沒有固定的指向。然而，經紀人關於外形的模糊規範確實發揮着作用，模糊規範將那些看起來不好的姑娘淘汰掉，留下適應模特工作的人。這種外形的規範本身「恰恰超出她們的視野範圍」，它的形成總是與成功的時尚雜誌的照片相聯繫<sup>㉑</sup>，這意味着規範本身是變化的，是管理者在市場喜好的基礎上，通過對於成功者的總結而得出的，是一種對於最佳常態的追求。類似地，在奢侈品零售行業中，管理者依據審美品質尋找合適的員工，而審美品質沒有確切的內容，卻同時指向勞動者多種行為。在審美品質的作用下，管理者一方面招募員工，另一方面大量解僱員工。零售業的不穩定就業形式，使得常態規範能在勞動者大量流動的基礎上淘汰危及整體安全的個人<sup>㉒</sup>。

確立規範和常態規範分別對應着福柯所論述的規訓權力和生命權力。福柯在論述兩種規範代表的不同權力技術時，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增大肉體的規訓和人口的調節，讓它們變得更加有用和馴服。它還要求能夠增強各種力量、能力和一般生命的權力手段，而〔同時〕不至於使得它們變得更加難以馴服」<sup>㉓</sup>。就此而言，兩種權力技術在勞動中不是單獨運行，也不是一個替代另一個的關係，而是交織在一起的；規訓本身會激起顯而易見的衝突，這時就需要生命權力的技術使得整體人口馴服。這意味着勞動過程不僅應該深入生產實踐之中，探尋微觀的確立規範，也應該觸及工作現場的範圍之外、但切實在發揮作用的常態規範。

無論是布若威還是布雷弗曼，工作場所都是他們分析勞動控制的核心。布雷弗曼將工作場所視為權力體系和階級對抗的場所，布若威更進一步認為是車間裏產生的文化、組織因素主導工人的勞動過程<sup>㉔</sup>。借助對生產中確立規範的分析，既往研究將塑造主體的因素娓娓道來。但這種分析必須建立在穩定的工作場所和工作中普遍的確立規範的基礎上。然而隨着監控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業形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諸如彈性工作、靈活就業、非正規就業等形式層出不窮，工作場所更是遍及所有的社會空間。在這種情況下，穩定的工作場所不復存在。尤其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下，社會生活中的勞動不像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那樣顯而易見，只有當工人以自己的身體為形式，成

為用戶和平台之間的接口處時，勞動才會顯現。例如，當外賣員騎着電動車將食物送到消費者手上時，而在其他時候，工人感受到的是一種相對不受控制的「自由」處置。這也意味着穩定的勞動關係以及由此形成的各類社會關係隨之削弱。隨着勞動者趨於原子化，管理者很難在生產實踐中提取出工人共享的具體規範。

在這個意義上，下載勞動是一種「高監管和低反抗」的勞動。通常狀態下，高度的監管可能引發勞動者較為激烈的反抗行為。但是，監控資本主義通過對「現實」的塑造，成功地實現了「高監管和低反抗」的並存。因為這種高強度的監管體系所確定的規則對工人是「自然」給定的、常規化的，勞資之間沒有任何協商談判的餘地。儘管平台勞工也會採取各種手段來抵抗規則，例如利用系統漏洞來爭取權益，構建社會關係網絡來化解矛盾，但是，這種反抗只是有利於平台彌補漏洞，不斷優化算法，而不能給勞動者本身帶來利益。

## 四 結語

如果說過去的勞動過程研究意味着對於特定工作場所的勞動控制與反抗的分析，那麼，在勞動日趨碎片化的情況下，這種分析只能愈來愈趨於分散的、個體化的解釋。往往在一個行業的不同個案研究中，研究者可以發現多條並行不悖的勞動控制策略，並且難以分清哪種手法佔據主導位置，這導致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碎片化的境地。對於各類控制策略、各類規範的概括分析愈來愈缺少普遍性，甚至使得勞動過程研究轉變為對於繁瑣技倆的總結。因此，如果說確立規範是一種中心化的規範，要求每個勞動者都按照它的模式行動，那麼常態規範則是一種去中心化的規範，它的運行基於將個體作為整體的元素處置，從而有助於我們從整體上考察勞動控制，避免研究出現碎片化傾向。

### 註釋

① 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9).

②⑩ Shoshana Zuboff,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0, no. 1 (2015): 75-89.

③ 福柯 (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纓譯：《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書店，2018)，頁 193。

④⑪ 福柯著，錢翰、陳曉徑譯：《安全、領土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頁 72；78-79。

- ⑤⑩ 布若威 (Michael Burawoy) 著，李榮榮譯：《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87-93；77-79。
- ⑥⑧⑨⑳ 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著，方生等譯：《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的勞動退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頁 61；61；156；98。
- ⑦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5), 41-42.
- ⑪⑳ 聞翔、周瀟：〈西方勞動過程理論與中國經驗：一個批判性的述評〉，《中國社會科學》，2007 年第 3 期，頁 29-39。
- ⑫ 何明潔：〈勞動與姐妹分化：「和記」生產政體個案研究〉，《社會學研究》，2009 年第 2 期，頁 149-76。
- ⑬ 藍佩嘉：〈銷售女體，女體勞動：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的身體勞動〉，《台灣社會學研究》，1998 年第 2 期，頁 47-81。
- ⑭ Arlie R. Hochschild,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⑮ Amy S. Wharto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al Lab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5 (August 2009): 147-65.
- ⑯⑳ Christine L. Williams and Catherine Connell, "'Looking Good and Sounding Right': Aesthetic Labor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Retail Industry", *Work and Occupations* 37, no. 3 (2010): 349-77.
- ⑰ 米爾斯 (Ashley Mears) 著，張皓譯：《美麗的標價——模特行業的規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 ⑱⑳ 鄭廣懷、范一杰、杜思齊：〈情商與常態規範：網絡主播的勞動過程〉，載王天夫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第十三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頁 85-106。
- ⑲ 福柯著，劉北成譯：《臨牀醫學的誕生》(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頁 218-21。
- ㉑ Gideon Kunda, *Engineering Culture: Control and Commitment in a High-tech Corporatio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㉒ Mun-cho Kim,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Privacy and Social Control: With Reference to the Case of the Electronic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Card in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 no. 2 (2004): 193-213.
- ㉓ 董慧娜：〈增強技術控制權——平台經濟下外賣騎手的勞動過程研究〉，載周曉虹、陳雲松主編：《中國研究》，第 27 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頁 228-48。
- ㉔ 馬克思 (Karl Marx)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資本論：節選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㉕ Damian O'Doherty and Hugh Willmott, "The Decline of Labour Process Analysis and the Future Sociology of Work", *Sociology* 43, no. 5 (2009): 931-51.
- ㉖⑳ 米爾斯：《美麗的標價》，頁 128、135；202。
- ㉗ 福柯著，余碧平譯：《性經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91。

鄭廣懷 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范一杰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生